

群龙无首 各乘其时

——从东方谋略思想看战略管理方法论的挑战，兼评 Reuer、Leiblein 和 Li (2020)*

□ 罗肖依 孙 黎

摘 要：Reuer 等 (2020) 指出战略管理领域的理论呈现多元化、碎片化的状态，呼吁通过四大经典问题进行整合。本文论辩东方谋略思想与西方战略四大经典问题有不同的兴趣点，战略学科的碎片化其实有利于东西方不同战略哲学的对话与交流；通过多元方法论的装备，中国学者可以复兴东方谋略思想。因果识别是战略管理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演进趋势，但是以统计模型为主导的因果推断与追求整体论的东方谋略思想有很大的差异，遮盖了战略现象的丰富性。从东方谋略立场出发，本文评价了战略领域因果识别的实验、准实验及现场试验研究方法，以及能够解决复杂因果关系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此外，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兴起，运筹学、计算语言学及生物信息学等领域已经开始放弃因果识别的分析方法，转向预测的方法，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战略管理学者应该更新方法论的装备，体现东方谋略所强调的竞争动态性、不确定性以及格局观，从而为全球战略管理学科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战略管理；东方谋略；研究方法论；定性比较分析；大数据；人工智能

一、引言（战略管理中的多元理论范式）

Reuer、Leiblein 和 Li 三位教授的论文《战略管理的基础与未来：对中国学术的启示》分析了战略管理领域发展历经的四个阶段：战略管理的诞生、战略管理经典问题的具体化、战略管理领域理论基础的深化和发展、战略管理研究的专业化和因果识别方法。Rumelt 等 (1994) 确立了能够独特定义战略管理领域的四大经典问题：

*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公司主导联合体利益相关者取向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72002091）的资助。

企业的行为是怎么样；为什么企业是异质的；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的范围；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跨国竞争中的成功或失败。一直以来，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是：“组织如何通过它们在市场中的行为及资源配置决策来创造和获取价值。”这些经典问题激发了战略学者更为系统地发展和检验命题，东方学者似乎在定义战略的时候，更受到孙子等兵家传统的影响，追求战略的最高境界不是“百战百胜”，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略更应该是谋略，也就是在竞争中更巧妙地运用资源与力量，组织上实现“奇正相生”，从而避实击虚、以弱胜强，而最终检验战略的试金石不是西方“竞争中的成功或失败”，而是组织的生生不息（罗肖依和孙黎，2019）。当然，西方战略从《圣经》中雅各的欺诈、大卫出其不意打击歌利亚开始，到奥德修斯、马基雅维利，再到克劳塞维茨，也都强调欺骗、诡诈、迂回、速度等各种策略（Freedman，2015）。反映到现代西方战略研究中也考虑如何巧妙地运用资源与力量，比如资源配置、拼凑（bricolage）、结构（configuration）等（Miller，2017；Mintzberg et al.，2001）。但明茨伯格等在《战略历程》中列举的十大流派也没有涵盖东方谋略思想的贡献。

许多华人学者深受东方谋略思想的影响。例如，陈明哲创建动态竞争理论（Chen，2009）、陆亚东与董林雪英提出的跳板理论（Luo & Tung，2007），完全突破了Rumelt等提出的四个问题的视角，他们的理论模型也跳出了Reuer等（2020）对战略管理理论划分的三

类：竞争优势理论、企业组织理论、资源配置和战略投资理论。

战略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否如Reuer、Leiblein和Li三位教授提出的多元化、碎片化会是一个悲观前景？战略理论的发展是否应该回到统一的四大核心经典问题呢？战略管理领域并没有收敛于一个单一的理论视角，该领域并没有形成一个“共享的理论观念、价值观、工具和技术”的学科范式（Kuhn，1970）。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坏事，反倒为东西方学者的对话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作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战略管理除了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的思想观念，还从政治科学、演化生态学、生物学、系统科学及哲学中引入各种概念和理论，进而逐渐形成战略管理领域自己的理论，如资源基础观和知识基础观、行为战略、竞争动态、公司战略、创新和技术战略、战略变革、制度和非市场战略、利益相关者理论、战略领导力等（Durand et al.，2017）。战略管理领域中的多元理论范式发展，并没有收敛于一个单一的理论视角，而是强化了该领域开放、弹性及多元的本质。当然，东西方战略学者都面对同样的战略实践，例如把组织（尤其是商业组织）作为主要的分析单位，识别组织在价值创造、价值获取、价值分配，以及实现组织结果的中介过程（如创新性、竞争密度、变革、并购、联盟、合法性、声誉及地位）方面的差异（Durand et al.，2017），这些共同面对的战略实践又可以把东西方战略学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用表1比较了东西方战略理论的不同。

表 1 东西战略理论的对话

	西方战略管理	东方谋略智慧
核心问题	企业的行为是怎怎样的？为什么企业是异质的？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的范围？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跨国竞争中的成功或失败？	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何避实击虚、以弱胜强？
“试金石”（绩效标准）	竞争中的成功或失败	组织的生生不息
典型理论	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动态竞争理论；跳板理论；联系、杠杆、学习（LLL）追赶理论等
主导方法论	因果关系识别	定性比较分析，探索更多的可行方法
哲学基础	批判实在论	阴阳整体论

当战略理论在全球多元发展时，中国学者应该如何做出更大的贡献？最近一个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和争论的话题是：“中国战略管理学者应该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检验西方理论，抑或开发适应中国管理实践的新的理论？” Tsui（2004）及井润田等（2020）认为应该扎根本土情境做有意义的本土化研究。李海洋和张燕（2016）认为应该把中国情境或实践放到更普适化的理论背景中去讨论，并在普适化理论与中国情境之间进行反复的验证，以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武亚军（2015）认为我们应该借鉴西方管理学和战略管理领域的多元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扎根于中国管理实践，来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我们的立场是，中国学者要将东方谋略思想与实践的丰富结合起来，从方法论上实现创新与整合，从而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实践与理论。

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知识创造的质量，以及对战略管理领域的知识贡献。我们先对 Reuer 等（2020）推崇的因果关系的识别作为核心方法论进行评价，在方法论多元化的框架下，我们认为以定性比较分析（QCA）的复杂因果方法可能更符合东方谋略渊源；然后我们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的

时代背景下，提出战略管理领域方法论的创新。

二、因果识别能涵盖东方谋略思想中的“庙算”吗？

给定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现象的复杂性，以及内生性问题，实证上确立因果关系是非常有挑战的（Hamilton & Nickerson, 2003；Rocha et al., 2019）。Jones（1985）认为实验研究是解释变量之间因果关系最强有力的技术，Antonakis（2017）及 Eden（2017）也认为实验方法是科学研究的“黄金标准”。Colquitt（2008）呼吁更多采用实验研究方法的论文投稿至 AMJ。尽管实验研究方法非常重要，但是它在战略管理领域中的应用还非常有限，尤其是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experiments），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实验研究缺乏现实主义、经常使用学生作为被试对象，以及较低的外部效度的批判（Colquitt, 2008）所造成的。对实验室研究的批判导致很多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者采用非实验的、问卷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验方法被完全忽视，Grant 和 Wall（2009）强调准实验研究（quasi-experiments）的好处，以及现场试验（field experi-

ments) 对战略领域的贡献 (Chatterji et al., 2016)。

战略管理领域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如塑造一种强的公司文化、雇用新的 CEO, 或者开发一种新的能力, 这些都与企业绩效相关, 但是它们并不是在企业中随机发生的。Chatterji 等 (2016) 提出了方法论的创新, 通过使用“小”实验来回答战略领域中的“大”问题, 研究者可以使用现场试验创造外生差异来识别无噪声的因果关系, 这可以使研究者去做问题驱动的研究, 而不是受限于现有的观测数据。此外, 现场试验还可以评价企业内部特定的过程和活动, 但是传统的数据来源并不能提供有关内在过程的细节。现场试验的结果变量并不一定是企业绩效, 可以是某一变量或行为的前置因素, 使用现场试验的方法可以揭示管理者为了提高企业绩效进行能力开发的行为洞察力。

战略管理与公司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是, 企业的长期取向是否能够提高企业价值及促进公司的长期性投资。基于代理理论的观点, 管理者是短视的, 采取长期取向 (给管理者提供长期激励) 能够使管理者的利益与长期价值增加相一致, 进而增加企业价值。如果忽视遗漏变量的影响, 直接考察长期取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果可能是虚假相关的, 因为, 不可观测的因素如管理者能力与投资机会等, 很可能同时正向影响企业的长期取向与绩效。因此, Flammer 和 Bansal (2017) 使用准实验的方法来验证长期取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 也即使用股东提案 (长期高管薪酬) 以微弱边际的通过与否 (如 50.1% VS 49.9%) 来表示高管长期激励的外生变化, 这种微弱通

过的提案类似于长期激励的随机分配, 因此能够提供一个较为“干净的” (clean) 因果估计, 研究结果发现长期取向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 以及促使公司增强创新和培养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战略管理领域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话题是, 公司社会责任投资 (CSR) 是否能够提高公司的财务绩效 (CFP)。有关 CSR-CFP 关系的研究激发了大量学者的兴趣, Margolis 等 (2007) 的研究显示, 1972~2007 年, 有 167 项研究考察 CSR-CFP 的关系, 但是传统的研究大多是将 CFP 的度量指标 (Tobin's Q, ROA) 与 CSR 的度量指标 (KLD 指数) 进行回归, 这样做的一个局限是 CSR 与 CFP 之间的关系是内生的, 可能会存在其他因素同时影响公司从事 CSR 活动, 以及公司财务绩效, 比如实施长期 CSR 战略的 CEO 更可能使公司获取更高的绩效 (由于这些 CEO 具有较高的才能), 因此, 使用传统方法条件下, CSR-CFP 的因果推断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为此, Flammer (2015) 采取准实验的研究设计, 使用回归不连续方法考察股东发起的 CSR 提案的微弱通过与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这样可以保证以 50.1% 投票率“微弱通过” CSR 提案的公司与以 49.9% 投票率没有通过 CSR 提案的公司之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微弱通过的 CSR 提案提供了 CSR 随机差异的一种来源, 这可以被用来估计 CSR 与 CFP 之间的因果关系。Flammer (2015) 的研究结果发现 CSR 提案的微弱通过能够显著提高股东价值。

这些准实验的方法设计十分精妙, 令人拍案叫绝, 但是否能推广到股东投票以外更广泛

的战略实践？我们深感怀疑。Reuer 等（2020）也推荐了识别：因果关系的一些经典论文，但也警惕地认识到：过于强调因果关系识别可能会加速研究的碎片化。我们非常同意，单一的因果识别并不能涵盖战略实践的丰富性。在《计篇》中，孙子认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的“庙算”涉及对敌我双方“道、天、地、将、法”的各种因素。虽然单一因果识别可以帮助学术上澄清单一要素投入、条件改变或者政策变化对产出的影响，但要注意这些学术成果的受控因素很多，在战略决策复杂的因果链下，对这些学术成果应用不当，可能会误导战略决策，忽视单一因素与其他因素的耦合，可能在战略实践中犯下与赵括一样“纸上谈兵”的错误。近年来，战略管理领域常常被批判研究结果有限的可复制性、统计显著性检验的局限性（Bettis, 2012），科学研究与企业实践之间存在脱节和鸿沟（Hambrick, 2007; Landis & Cortina, 2014）。因果关系识别的方法论可能是加速这一脱节的原因。

三、定性比较分析可以更好地体现东方谋略思想的格局观

方法论如何体现“庙算”的复杂性？我们推荐基于集合的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QCA 方法与战略在复杂因素下决策相同的前提假设是，因果关系并不容易被打开，即结果几乎不是由单一成因导致的，成因也几乎不是相互孤立运作的；依据不同的情境特征，一个特定的成因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

（Greckhamer et al., 2008）。孙子最推崇的谋略，是“全争于天下”；同样，QCA 方法认为因果关系是依赖特定情境和组态的、是复杂的，否定任何形式的恒定因果关系（Fiss, 2007; Ragin, 1987, 2000），关注的是因果性比较复杂及不同的条件产生相同的结果，为此更注重全胜的“格局”。回归分析通过平均的方法，排除了案例的独特性并且忽略了“异常值”，QCA 方法与概率性因果推断有着本质区别，QCA 方法更为关注因果关系的多样性。此外，QCA 方法拓展了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因果效应不再具有一致性，一个给定的原因与某些条件组合时可能对结果产生正向影响，而与其他条件组合时可能产生负向影响。QCA 方法不再假设因果关系的对称性，即某个结果的出现与否可能需要不同的“原因组合”来解释（伯努瓦·里豪克斯和查尔斯·C. 拉金，2017）。组态分析的多维度、整体性特征使其在分析战略格局、多种资源的组合配置、资源与形势的耦合上具有优势（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

QCA 方法在战略与公司治理领域的应用也在不断发展，现有研究在考察一个治理机制或另外一个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时是比较离散的状态。Misangyi 和 Acharya（2014）整合现有的理论和研究识别“治理集合”的概念，也即治理机制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要素相互依赖的系统（Aguilera et al., 2008）。Misangyi 和 Acharya（2014）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来探讨 S&P 1500 企业能够获取高盈利性的治理机制的组合，结果表明当 CEO 利益一致、设计与监督机制是互补存在而不是作为替代存在时，企业能够获取高利润。

QCA方法也可以用于分析资源与形势的耦合,例如企业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如何应对来自股东和员工的压力? Gupta等(2020)基于不同国家的企业如何在“遵从”(优先重视当地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差异化”(优先重视当地其他公司所忽视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之间获取平衡,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识别了利益相关者参与活动、国家制度、企业层面的因素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匹配,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参与战略(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rategies)的类型,fsQCA可以用来识别组织现象的潜在因果复杂性,即多个条件因素是如何与一个结果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可能会出现多个路径产生一个特定的结果(Misangyi et al., 2017)。Gupta等(2020)的研究发现强调了把利益相关者参与-高企业绩效联系在一起的多情境依赖路径。西方学者早期结构学派依赖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类型(typology)等方法,QCA方法的兴起有利于结构学派的复兴(Miller, 2017)。但显然东方古典谋略与注重变革过程的结构学派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鼓励东方学者通过QCA方法体现东方古典谋略之美。

四、大数据、人工智能如何帮助东方谋略思想的复兴?

当前的统计模型文化阻止我们更为精确地预测有价值的结果,导致许多理论模型不能体现某一现象关键的驱动因素,也不能充分地吸收战略决策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例如东方古典谋略中的“始计”“虚实”“谋攻”。我

们期待大数据时代下的预测算法与人工智能能拓展谋略问题的解决(Putka & Oswald, 2016)。例如《星际争霸2》游戏中战争迷雾(Fog of War)的设定,已经非常接近战略决策中的各种不确定性(例如《孙子兵法》中的《用间篇》),而西方战略理论的四大问题却基本没有涉及如何通过战略试探、虚实、内间等策略,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利中之害”“害中之利”的阴阳转换策略。谷歌的Deepmind则通过人工智能算法AlphaStar为战略展现令人振奋的研究前景。同时大数据科学观是建立在可复制的模型基础之上的,理论和模型可以不断地被检验、验证及更新,这是由于可获得的数据的量(volume)、多样性(variety)及速度(velocity)都能得到保证(Wenzel & Quaquebeke, 2018),从而使新训练的机器学习算法为战略拓展新的研究机遇。

预测分析在理论构建、理论检验及相关性评价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也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必要的构成部分。尽管预测分析是一个核心的科学活动,但是战略管理领域的实证模型被因果解释的统计模型所主导,统计推断被用来检验因果假设,以及评价潜在因果模型的解释力,但是解释力并不意味着预测力(Forster & Sober, 1994)。目前,在批判实在论的科学哲学下,因果解释统计模型对战略管理领域的理论构建和理论检验处于主导地位(Tsang, 2017),预测分析在社会科学和战略管理中的应用还比较稀缺,但是预测分析在计算语言学和生物信息学中经常被使用,并且已经取得了理论上的进步。在生物信息学中,预测模型是理解一个生物系统的黄金标准,并且能

够使研究者考察疾病的潜在原因，帮助他们确立诊疗方案。

鉴于此，我们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应该如何适应、发现和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研究机会呢？Tonidandel 等（2018）认为，首先，我们要学会适应没有一个“真正的”模型的存在，这与东方古典谋略中“兵无常形”的理念是一致的。多元回归及很多广义的线性模型衍生物（逻辑回归、结构方程模型、多层回归模型）均假设研究中正确的模型正在被使用，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的理论很少“充分地”发展以囊括所有的甚至很多最为相关的变量，此外，研究者也许常常并不知道这些遗漏变量是什么。因此，我们仅检验非常有限的几个变量，而不能在模型中吸收关键的遗漏变量会对我们希望从数据中获取的结论的正确性有重要的影响（Antonakis et al., 2010）——想象一下战争迷雾对战略决策的影响，崇尚理性决策的麦克纳马拉在越南战争中有血的教训^①。现有战略管理研究中的统计方法，首先识别最为匹配的模型，然后从被选择的模型中理解结果，这种方法没有意识到我们选择的“最优模型”中存在的 uncertainty，也就是标准化的统计实践忽视了模型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过度信心推断，以及决策更具风险性（Hoeting et al., 1999）。相比传统的方法，大数据分析依赖多个模型或模型的集合，不是选择唯一最优的模型，并假设它能够正确地描述数据的产生过程，模型集合分析来自已有变量的所有可能的模型，使用很多技术来加总结果（如自举汇聚法、装

袋法、提升法、贝叶斯模型平均法等）。集合模型优于选择的最优模型，能够产生更好的预测准确性（Kaplan & Chen, 2014）。另外，把战争迷雾的不确定性吸收进模型或机器学习算法中能够帮助我们完善现有的理论，即识别新的有意义的我们原本没有意识到的变量，例如 AlphaGo 通过机器学习，发展出击败人类职业围棋选手的新策略，这些变量与策略可能创新我们的理论。因此，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是新的理论“发现”和理论构建的一种来源，它们可以为现有变量之间的关系和模式提供一种新的洞察力。

其次，东方古典谋略重视复杂因果，例如《孙子兵法·军形篇》中“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就是典型的非线性战略运筹。大数据分析可以避免传统的线性假设，使我们更容易建立非线性关系模型，并且能够更好地获取不连续的改变。现代数据分析方法如随机森林、人工神经网络及支持向量机能够识别数据中线性和非线性的模式，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可以在没有预先设定非线性存在的确切的模式下来识别非线性关系及它们之间的交互性。

最后，《孙子兵法》强调“谋以度量夺，变以数称胜”，大数据分析技术有利于变量度量的精进，深入识别各种变量从量到质的变化。大数据技术可以使我们从更多样化的数据来源中去度量战略管理领域难以直接观测和度量的变量，如董事长和 CEO 的个性特征、价值观、

^① 参见纪录片《战争迷雾》（*The Fog of War*），美国著名独立纪录片导演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编导，获第76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风险偏好,董事会与高管的认知能力、注意力分配等重要概念。

五、结语:“见群龙无首,吉”

Reuer、Leiblein 和 Li 三位教授呼吁我们要利用独特的中国现象、实践及制度背景来拓展战略管理理论,同时也要我们警惕为了追逐战略管理领域的因果识别而进行因果识别,提出现有因果识别方法的不完美和局限性。我们同意他们的观察,过度关注因果识别,过度追求实证结果的显著性,会导致研究者过于重视一些特殊数据比较可得的项目,而忽视组织中本身有趣的、更有价值的战略管理问题。

为了打破战略研究碎片化的困境,Reuer 等(2020)呼唤回到四大经典战略大问题,实现更好的理论整合。我们用表1比较东西战略理念的不同,提出不同看法。中国学者可以从东方古典谋略中汲取养分,结合方法论的多样性,利用各种不同研究方法[如统计推断、实验、准实验、现场试验、回归不连续方法、案例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QCA)、大数据和AI预测技术等]的优缺点,充分对现有研究方法进行整合、互补式利用,进行战略管理领域研究方法论的创新,进而更好地检验、发展和构建战略管理理论。中西对话可以使方法论更加多元,与Pratt等(2020)最近提出的“方法的拼凑”(methodological bricolage)的概念相一致,他们认为有很多方式做高质量的质化研究,但是方法拼凑为我们思考方法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框架。而东方古典谋略则早为我们战略理论的创新与建构打下深厚的基础,借助方法的装备,

贵德畜之,尊道生之,群龙无首之时,就是天道最大的吉祥。

接受编辑: Haiyang Li

收稿日期: 2020年11月13日

接受日期: 2020年11月19日

作者简介:

罗肖依,管理学博士,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治理与战略管理。研究成果发表在《南开管理评论》《中国工业经济》《外国经济与管理》等国内外刊物上。

孙黎,美国洛厄尔麻省大学创业与创新副教授,达拉斯德州大学全球战略管理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创业、战略管理、国际企业与公司创新,共有54篇英文文章在西方管理学报上发表,其中15篇名列 *Financial Times* 全球顶级研究学报。

参考文献

- [1] [比] 伯努瓦·里豪克斯、[美] 查尔斯·C. 拉金:《QCA 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杜运周、李永发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
- [2] 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管理世界》,2017年第6期。
- [3] 井润田、程生强、袁丹瑶:《本土管理研究何以重要?对质疑观点的回应及对未来研究的建议》,《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年第8期。
- [4] 李海洋、张燕:《情境化知识与普适化理论的有机结合——探索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之道》,《管理学季刊》,2016年第4期。

- [5] 罗肖依、孙黎：《生生不息：破解绩效导向的悖论》，《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年第5期。
- [6] 武亚军：《基于理论发展的管理研究范式选择与中国管理学者定位》，《管理学报》，2015年第5期。
- [7] Antonakis, J. 2017. On doing better science: From thrill of discovery to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8: 5–21.
- [8] Antonakis, J., Bendahan, S., Jacquart, P., & Lalive, R. 2010. On making causal claims: A review and recommendations. *Leadership Quarterly*, 21: 1086–1120.
- [9] Aguilera, R. V., Filatotchev, I., Gospel, H., & Jackson, G. 2008. An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Costs, contingencies, and complementarit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19: 475–492.
- [10] Bettis, R. A. 2012. The search for asterisks: Compromised statistical tests and flawed theor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3: 108–113.
- [11] Chatterji, A. K., Findley, M., Jensen, N. M., Meier, S., & Nielson, D. 2016. Field experiments in strategy research.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 116–132.
- [12] Chen, M. -J. 2009. Competitive dynamics research: An insider's odysse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6: 5–25.
- [13] Colquitt, J. A. 2008. Publishing laboratory research in AMJ: A question of when, not if.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1: 616–620.
- [14] Durand, R., Grant, R. M., & Madsen, T. L. 2017. The expanding domain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the quest for integr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8: 4–16.
- [15] Eden, D. 2017. Field experiments in organizations.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 91–122.
- [16] Fiss, P. C. 2007. A set-theoretic approach to 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 1180–1198.
- [17] Flammer, C. 2015. Do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ead to superior financial performance?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 *Management Science*, 61: 2549–2568.
- [18] Flammer, C., & Bansal, P. 2017. Does a long-term orientation create value? Evidence fro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8: 1827–1847.
- [19] Forster, M., & Sober, E. 1994. How to tell when simpler, more unified, or less ad hoc theories will provide more accurate predictions.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45: 1–35.
- [20] Freedman, L. 2015. *Strategy: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1] Grant, A. M., & Wall, T. D. 2009. The neglected science and art of quasi-experimentation: Why-to, when-to, and how-to advice for organizational researcher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2: 653–686.
- [22] Greckhamer, T., Misangyi, V. F., Elms, H., & Lacey, R. 2008. Using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An examination of combinations of industry, corporate, and business-unit effect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1: 695–726.
- [23] Gupta, K., Crilly, D., & Greckhamer, T. 2020.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rategies,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firm performance: A 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41: 1869–1900.
- [24] Hambrick, D. C. 2007. The field of management's devotion to theory: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1348–1352.
- [25] Hamilton, B. H., & Nickerson, J. A. 2003. Correcting for endogeneity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Strategic Organization, 1: 51–78.

[26] Hoeting, J. A., Madigan, D., Raftery, A. E., & Volinsky, C. T. 1999.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A tutorial. *Statistical Science*, 14: 382–417.

[27] Jones, R. A. 1985.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Sunderland: Sinauer Associates.

[28] Kajueter, P., Klassmann, F., & Nienhaus, M. 2019. The effect of mandatory quarterly reporting on firm value. *The Accounting Review*, 94: 251–277.

[29] Kaplan, D., & Chen, J. 2014.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for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49: 505–517.

[30]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1] Landis, R. S., & Cortina, J. M. 2014. *Is ours a hard science (and do we care)?* In C. E. Lance & R. J. Vandenberg (eds.), *More statis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myths and urban legends*. New York: Routledge.

[32] Luo, Y. & Tung, R. L. 2007.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8: 481–498.

[33] Margolis, J. D., Elfenbein, H. A., & Walsh, J. P. 2007. *Does it pay to be good? A meta-analysis and re-direction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Working paper.

[34] Miller, D. 2017. Challenging trends in configuration research: Where are the configurations? *Strategic Organization*, 16: 453–469.

[35] Mintzberg, H., Ahlstrand, B., & Lampel, J. 2001. *Strategy Safari: A guided tour through the wilds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36] Misangyi, V. F., & Acharya, A. G. 2014.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A configurational examin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7: 1681–1705.

[37] Misangyi, V. F., Greckhamer, T., Furnari, S., Fiss, P. C., Crilly, D., & Aguilera, R. V. 2017. Embracing causal complexity: The emergence of a neo-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nagement*, 43: 255–282.

[38] Putka, D. J., & Oswald, F. L. 2016. *Implications of the big data movement for the advancement I–O science and practice*. In S. Tonidandel, E. King, & J. Cortina (eds.), *Big data at work: The data science revolu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39] Pratt, M. G., Sonenshein, S., & Feldman, M. S. 2020. Moving beyond templates: A bricolage approach to conducting trustworthy qualitative research.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https://doi.org/10.1177/1094428120927466>.

[40] Ragin, C. C.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1] Ragin, C. C. 2000. *Fuzzy-set soci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2] Reuer, J. J., Leihlein, M. J., & Li, W. 2020. Foundations and futures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for scholarship in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Management*, 5: 1–21.

[43] Rocha, V., Van Praag, M., Folta, T. B., & Carneiro, A. 2019. Endogeneity in strategy–performance analysis: An application to initial human capital strategy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2: 740–764.

[44] Rumelt, R., Schendel, D. E., & Teece, D.

1994. *Fundamental issu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A research agenda*.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45] Tonidandel, S., King, E. B., & Cortina, J. M. 2018. Big data methods: Leveraging modern data analytic techniques to build organizational science.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1: 525–547.

[46] Tsang, E. W. K. 2017. *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Research*. New York: Routledge.

[47] Tsui, A. S. 2004. Contributing to global management knowledge: A case for high quality indigenous

research.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1: 491–513.

[48] Tsui, A. S., & Jia, L. 2013. Calling for humanistic scholarship in China.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9: 1–15.

[49] Wenzel, R., & Van Quaquebeke, N. 2018.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big data in organizational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A review of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1: 548–591.